

中国古代名著今译丛书

四書譯注

□ 乌恩溥 注译



白雲山

1980年



中国古代名著今译丛书

四書譯注

□ 乌恩溥

注译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新登字07号

Sì shū yì zhù

四书译注

乌恩溥 注译

责任编辑：李本达

封面设计：余力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15.25印张5插页 360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1990年8月第1版 1996年10月第4次印刷

印数：17 481—27 480册 定价：23.00元

长春科技印刷厂印刷

ISBN 7-80626-135-6/I·21

前 言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在我国历史上，从南宋时期起被编辑在一起，称为“四书”，作为儒家的“经书”在社会上广泛地流传着。

《大学》、《中庸》原来分别是《小戴礼记》书中的一章，在南宋以前没有单独地刊行过。早在唐代，韩愈、李翱从维护儒学的遗统出发，十分推崇这两篇文章，把它和《论语》、《孟子》相提并论；到了宋代，程颢、程颐更是竭力推崇这两篇文章。关于《大学》，他们说：“《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关于《中庸》，他们说：《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二程把《大学》、《中庸》推崇到了极点。朱熹继承了二程的思想，也竭力推崇《大学》和《中庸》。他说：《大学》是“为学纲目”，“修身治人的规模”；“先通《大学》，立定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朱子语类》，卷十四）关于《中庸》，朱熹用伪古人尚书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诀来阐发《中庸》的“传授心法”。他认为《中庸》所谓的“天命”、“率性”，就是指的“道心”；所谓“择善固执”，就是指“精”、“一”；所谓“君子时

中”，就是指的“执中”。因此，可以说《中庸》是“提挈纲维，开示蕴奥”，是“前圣之书”所不及的。朱熹要求学习的人要“得于辞而通其意”，把“孔门传授心法”，“诵读而传心焉。”在二程和朱熹看来，《大学》和《中庸》，一个是“初学入德之门”，一个是“孔门传授心法”，都具有很高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从《小戴礼记》一书中提取出来，作为单行本刊印，并且和《论语》、《孟子》并列在一起称为“四书”。

《孟子》一书，在宋代以前，人们是把它当作“子书”看待的，并没有取得儒家经典的地位。从北宋中期到南宋中期，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在当时的思想界，关于孟子的地位问题，曾经发生过激烈的论争。以李觏、司马光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激烈的排孟、抑孟。李觏说：“孙吴之智，苏张之诈，孟子之仁义，其原不同，其所以乱天下一也。”（《常语》）司马光说：孟子是“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此外，还有郑厚叔、冯休等人都极力批评孟子，贬低孟子。相反地，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则极力地尊孟、扬孟。二程说：“孟子大有功于世。”“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朱熹说：“《六经》如千斛之舟，而孟子是运舟之人。”从朱熹写了《读余隐之尊孟辩》这篇文章以后，尊孟和抑孟的论争就逐渐地偃旗息鼓了。孟子在儒学道统中的地位确定下来了。《孟子》书作为儒家的“经书”的地位也就成为定论了。

南宋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朱熹在福建漳州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汇辑到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人们把这套“经书”，简称作“四书”，从此“四书”这一名称就广泛地流行起来。不过，朱熹编定的“四书”的次序和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次序是不同的。朱熹说：“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

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四书》的最初刻本，就是按照朱熹说的这个次序安排的。后世由于《大学》、《中庸》篇幅较短，考虑到装订上的方便遂把两者合并到一起，逐渐地形成了现在通行的次序。

《四书》问世以后，就和《五经》并列起来，通称：《四书》、《五经》。那么，《四书》和《五经》的关系是怎样的呢？综观二程、朱熹的言论，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两套“经书”的内容所涉及的范围来看，有广、狭的分别。《四书》所包括的内容，主要是孔子、子思、孟子的著作，是儒家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著作，范围比较狭窄，但是，和儒家学派的关系是直接的。《五经》包括《诗》、《书》、《易》、《礼》、《春秋》，都是孔子以前的所谓“古圣先贤”的“先王之教”，范围比较宽泛，和儒家学派的关系比较间接。第二，从两套“经书”的大小、远近、难易的程度来看，《四书》的量少，《五经》的量多；从时代上看，《四书》距离比较近，《五经》距离比较远；从阅读的难易程度来看，《四书》易，《五经》难。两套“经书”在这几方面是有明显的差别的。第三，从两套“经书”在教育中所处的地位来看，《四书》是初级阶段的必读教材；《五经》是较高阶段的必读教材，两者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朱熹说：“今欲直得圣人本意不差，未须理会《经》，先于《论语》、《孟子》中专意看他。”（《朱子语类》卷一百零四）作为一种进学的程序，先读《四书》，后读《五经》，这是由初级阶段向较高阶段发展的过程。因此可以说，《四书》在封建社会后期的初级教育阶段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朱熹编定《四书》的目的，除了前面提到的，确立《四书》在封建社会后期的初级教育中的地位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通过《四书》的注释，建立程朱理学的理论体系，确立程

朱理学在儒学道统中的地位。朱熹在编定和刊刻《四书》以后，用了四十多年的时间，七易其稿，写就了《四书集注》。朱熹注释《四书》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抛开了汉儒重视训诂的注经传统，把义理的阐述和发挥放到了首要的地位。特别是突出地用二程和他的门弟子的思想、言论来阐释和发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内容，使得《论语》、《孟子》等儒家的著作披上了理学的外衣，成了程朱理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朱熹通过《四书集注》构筑起来的理学的理论体系，包括以“天理论”、“性论”为内容的宇宙观；以及“格物致知论”为内容的认识论；以“政治论”、“教育论”为内容的社会政治哲学；以“道统论”为内容的儒家道统说。这是一个结构严紧的具有高度思辨性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论体系。

上述一些事实，就是《四书》产生的历史背景。今天，在我们阅读《四书》的时候，应该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关于《四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四书》从它问世时期起，到现在已经将近八百年了。在这将近八百年的时间里，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把《四书》作为庠、序，即地方学校的基础教材而广泛地使用着。这部书既是一部文化课本，同时又是一部政治课本或道德伦理课本。作为文化课本，封建统治阶级希望通过这部书的学习来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作为政治课本或伦理道德课本，封建统治阶级力图通过这部书的学习，培养人们的忠孝思想，和陶冶人们的道德情操。应该看到，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四书》、《五经》对人民群众进行封建的政治思想教育是做得很“成功”的。中国封建社会所以延续这样长的时间，和封建统治阶级进行的封建的政治思想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分不开的。《四书》作为一部儒家的“经书”，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起到过很大

的作用，是值得进行深刻的探讨和研究的。另外，这部书作为儒家的“经书”，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它具有时间近、范围小、易读，以及和儒家的关系是直接的等特点，在今天看来，仍然不失为研究儒家思想的基本材料。因此，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四书》都有它值得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其次，关于《四书》的思想内容。《四书》作为儒家学派的“经书”，它反映了儒家思想从春秋时期到战国晚期的发展和演变。儒家学说创始于春秋时期的孔子。孔子奠定了儒家学说的基础。孔子死后，儒家学派发生了分化。《韩非子·显学》说：“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这里所说的“孟氏之儒”，指的是孟轲；“孙氏之儒”指的是荀况。儒家八派里，以孟、荀两派的影响最大。《四书》，就其思想内容来说，就是反映了儒家思想由孔子经过曾子、子思，到孟子的发展、演变历程。下面从天命论、人性论、认识论、道德论、政治论、教育论、道统论等七个方面分别加以叙述。

关于天命论。对于“天”，在孔子看来，它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天”具有自然的属性，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另一方面，“天”又是有人格的，有意志的主宰，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由此可见，孔子自己是相信天命。但是，孔子并不是消极地等待“天命”的安排，而是强调人的自我努力。孔子的“自然之天”的思想由荀况加以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而孔子的“意志之天”的思想则被子思、孟子所继承，发展成为主观唯心主义的“天命观”。相传子思所作的《中庸》，提出了“诚”这一哲学范畴，并认为“诚”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中庸》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由“诚”派生出来的。“诚”是天的根本特

征。人通过“思诚”、“至诚”、“诚之”的途径，就能够达到“天之道”的“诚”，就能够和“天道”合一，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孟子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一方面，他极力倡导“意志之天”，把它推崇到至高无上境界。在他看来，“天”虽不能违背民意，但是天的意志始终是至高无上的，是主宰并决定一切的。另一方面，孟子认为，只要能够“反身而诚”，就能够“尽心”、“知性”；能够“尽心”、“知性”，就能够“知天”。

综上所述，儒家学派的天道观，由孔子经过曾子、子思，到孟子，是沿着一条唯心主义的道路发展的。如果说在孔子那里，“天”还具有两重性的话，那么，经过曾子、子思，发展到了孟子，“天”就是主宰一切的人格神了。《四书》所反映的儒家学派的天道观，是唯心主义的天道观。这种唯心主义的天道观，和朱熹在《四书集注》里所宣扬的以“天理论”为内容的宇宙观，在本质上有着内在的联系，两者是一脉相通的；同时，两者又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

关于人性论。孔子很少谈论人性的问题。《论语·公冶长》记载：“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里记述孔子谈论人性的只有一句话，即：“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后来，子思在《中庸》中对儒家的人性论思想，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庸》开宗明义地宣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也就是说，“性”是上天的秉赋，一切事物的秉性都是上天赐给的。而这种上天赐给的秉性，体现在宇宙万物身上就是“诚”。因此，就人或宇宙万物来说，做到“至诚”，就是做到“尽性”或“知性”了。《中庸》以“诚”为基础的哲学，赋予了宇宙万物以道德的属性，为孟子的性善论开辟了道路。

孟子继承“诚”的哲学思想，把“诚”的哲学中关于人性问

题的主张，发展成为“性善论”学说。他认为，“人无有不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每个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而且所有这些都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天赋的“良知”、“良能”。正是由于有了这种“良知”、“良能”，因此，仁、义、礼、智等道德意识是与生俱来，先天固有的。虽然如此，外部环境对于人们的道德意识并不是没有影响的。孟子认为，由于外部的条件不同，人们的行为才有了不同的表现；为了克服外物对先验的道德意识的遮蔽和妨害，孟子提出了“求放心”的主张。如果克服掉不善的欲念，保养好先天的仁、义、礼、智等道德意识，使之发扬光大起来，就可以成就高尚的道德境界，直至成为“圣人”、“贤人”。达到这种境界以后，内心的善和外现的仪表、风度，就会表里如一，动容中止，完全合乎仁义。

以上可以看出，在人性论问题上，儒家学派的观点是有很大发展的。如果说人性问题在孔子那里，还仅仅是萌芽，那么，子思用“诚”的宇宙本体来阐释人性，就为“性善说”开辟了道路，到了孟子那里就形成了完整的性善说。思孟学派倡导的“性善说”，是和他们的唯心主义的天命观相表里的，是以他们的唯心主义的天命观为基础的。这是《四书》所反映的孔子、孟子关于人性问题的观点。至于朱熹通过《四书集注》所倡导的“天命之性”、“气质之性”、“天理”、“人欲”等主张，应该说是程朱学派的观点。这些观点和思孟学派的观点有着内在的本质的联系，但是，又有着明显的区别，这是不言自明的。

关于认识论。孔子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唯上智与下愚不移。”（《阳货》）“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虽然他提出“生而知之”的观点，具有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因素，但是，他指出人的天资、智力是具有差别

的。有的人生来就是聪明、智慧的；有的人生来就是愚昧的。这种天资上的差别是不可改变的。由于在天资、智力上有上、中、下的差别，所以在因材施教上也是应该有所不同的。这种见解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其次，在认识方法上，孔子坚持采取求实的态度。认识事物要从多方面入手，对于各种不同的见解，要有鉴别，有选择；同时，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孔子还强调认识事物切忌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反对主观臆断，固执己见。相传曾子所作的《大学》，也提出了“格物致知”的认识论观点。所谓“格物”，就是探讨、研究各种事物；所谓“致知”，就是达到对于事物的了解和认识。格物、致知的目的在诚意、正心。能够做到诚意、正心，就是做到了“知本”。即做到了认识的最高要求。这样就能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庸》进一步发展了《大学》的“诚意”、“正心”的思想，提出了“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的观点，认为“圣人”生来就具有“诚”的天性，生来就是“诚”的化身。“圣人”生来就是在天地境界的，生来就是和“天地参”的。因此，“圣人”是不须经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途径来提高道德修养的。“自明诚，谓之教”，必须经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过程，发扬自身的“诚”的本性，努力学习，加强自身的修养，才能够造就高尚的道德情操，达到“诚”的境界。从这里可以看出，《大学》、《中庸》是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关于“生知”、“学知”、“困知”、“下学上达”的思想。

孟子在《大学》、《中庸》的基础上，把儒家的认识论学说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他提出了“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上》）的命题。他认为，心的职能在于思维，思维是心所特有的一种能力。这种思维能力是上天赐给人类的。人

们有了这种思维能力，就应该运用这种思维能力把内心固有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培植起来，扩充起来，使之形成为仁、义、礼、智的道德观念。同时，让这种仁、义、礼、智的道德观念成为自身的主宰，支配自己的行动。这就叫作“立其大体”，这也就是“尽心”。只有“尽心”才能够“知性”。一方面“尽心”，一方面“知性”，通过“尽心”、“知性”的反复践履，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境界，最终达到尧舜的高度，这样就可以和“天地参”，成为“贤人”、“圣人”，这就叫做“知天”。“尽心”、“知性”、“知天”作为一条认识路线，属于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和孔子、《大学》、《中庸》的认识论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孔子、《大学》、《中庸》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总起来说，在认识论领域里，儒家的学说从孔子的“生知”“学知”、“困知”和“下学上达”的思想，发展到《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发展到《中庸》的“自诚明”、“自明诚”，再发展到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始终是沿着唯心主义的道路发展的。虽然其中有许多带有唯物主义性质的精辟见解，但是从根本上说，依然是以唯心主义为基础的。这点和朱熹通过《四书集注》倡导的“格物致知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两者是一脉相承的。不过，朱熹提出的“即物穷理”、“致吾之知”、“一旦豁然贯通”等命题，是二程、朱熹对于孔、孟的认识论学说的继承和发展，这些命题和孔、孟自身的命题是有区别的。

关于道德论。孔子倡导以礼为形式，以仁为内容的伦理道德学说。孔子认为道德无论就个人来说，还是就国家来说，都是必要的。就个人来说，高尚的道德修养是立身处世的基础；就社会、国家来说，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国家也

就得到治理了。道德是立国的根本。孔子的道德学说是以仁、礼、中庸为核心内容的。所谓“仁”，它的含义就是“爱人”。所谓“礼”，它的本质含义就是明尊卑，别贵贱，就是在封建等级制的基础上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规范化起来。所谓“中庸”，就是“允执其中”，既反对过，又反对不及。“仁”、“礼”、“中庸”在孔子的伦理思想里，是三位一体的完整统一体，是不可分割的。此外，孔子还提出了孝、悌、忠、恕、信、义、智、勇、温、良、恭、俭、让等许多伦理道德范畴。这些都是孔子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研究这些伦理道德范畴及其有关的思想，对于了解孔子的伦理思想是有重要意义的。

《中庸》一书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关于“中庸”的思想。《中庸》一书赋予“中庸”以双重的含义。首先，它赋予“中庸”以内心的道德修养的含义。其次，是方法论的含义。这就是说，在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时，要选择一个正确的立脚点，既反对过头，又反对不及。这种方法论能够运用得恰到好处，在儒家学派看来，也是一种美德。因此，《中庸》十分强调要重视并且培养“中庸”这种德行。能够造就成“中庸”这种美德，是比什么都重要的。

孟子继孔子、子思之后，进一步地倡导“仁”、“礼”、“中庸”的学说，同时，又把“仁”、“礼”、“中庸”的学说和心性学说结合起来，用“仁”、“礼”、“中庸”的思想来充实心性学说的内容，用心性学说来发扬“仁”、“礼”的精神，从而使两者结成一个整体。修养心性，从消极方面说，就是克制自己的私欲。一个人的私欲越多，存养的“仁”、“义”就越少。相反地，私欲越少，存养的“仁”、“义”就越多。减少私欲，有利于仁、义观念的增长；仁、义观念的增长又促进私欲的减少，两者是相互促进的。为了减少私欲以促进仁、义观念的增长，孟子主张要不断地

“反求诸己”。行仁的结果出了毛病和偏差，不要埋怨别人，要反过来问一问自己，有哪些做得不够的地方。孟子还强调“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他认为，心志是第一性的，是起主导作用的；气是第二性的，是从属的。气虽然充满在体内，但是，必须在心志的统率和支配之下才能起作用。就心志和气的关系来说，心志专一能够左右气；气专一也能影响、作用于心志，两者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从这样一种“志”、“气”关系的立脚点出发，孟子认为：用仁、义来充实“心”、“志”，让以“仁”、“义”为主体的“心”、“志”来统率气，就能够形成一种强大的“浩然之气”。它充塞在天地之间，具有无穷的力量。孟子十分重视由于道德修养所产生的精神力量和作用。

总起来说，在道德论的领域里，儒家学派是以“仁”、“礼”、“中庸”为核心建立起他们的理论体系的。不过，这中间也有继承和发展。譬如，关于“中庸”，孔子只讲了一句话，到了子思就赋予“中庸”以心性修养和方法论的双重含义。再如，关于“仁”、“礼”，在孔子做了深刻的论述的基础上，孟子又用心性学说做了进一步地阐释和发挥。这样就使得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更加完善起来了。至于朱熹通过《四书集注》宣扬的“存天理，灭人欲”等主张，那是二程和朱熹对于孔孟道德学说的继承和发展，不能把这些命题和孔孟的命题混为一谈。

关于政治论。孔子倡导仁政，主张德治。他认为，人口发达，生活富裕，广施教化，是仁政德治的标志。

对于执掌权力的统治阶级来说，孔子倡导“正名”和“克己复礼”。这样封建的等级秩序就能够得到维护了。“正名”和“克己复礼”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孔子倡导“正名”和“克己复礼”的根本目的，在于忠君尊王，在于维护封建的等级秩序。从这点出发，孔子极力反对政治上的僭越行为。他抨击季氏“八佾

舞于庭”，“旅于泰山”；抨击管仲“树塞门”、“有反坫”等等，都是主张“正名”和“克己复礼”的表现。

《大学》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主张和《礼记·礼运》倡导的“大同”思想是一致的。这是孔子政治思想的继续和发展，也是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的最高政治思想。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关于仁政的学说。从“仁心”出发，把仁爱推广到天下的妇孺老幼，就是实行“仁政”。孟子的仁政学说的内容包括：在政治上争取民心，取得老百姓的拥护。孟子反对施行暴政，反对过分剥削，主张与民同乐。孟子把他自己的这些主张叫做“王道”。他认为封建统治阶级只要行“王道”，就一定能够取得历史性的胜利。孟子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愿望和要求。

总起来说，在政治论的领域里，从孔子经过曾子、子思，发展到孟子，都是以“仁政”、“德治”的学说为核心的。所不同的是：孔子生当奴隶制生产关系行将崩溃的前夜，他力图用“仁政”学说来挽救行将崩溃的奴隶制度。这种补苴罅漏的做法，当然是无济于事的。孟子生当封建的生产关系业已建立的历史时期，他的政治学说在内容和孔子比较起来，有了很大的发展；他的政治理想和蓝图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愿望和要求，是有积极意义的。至于朱熹通过《四书集注》宣扬的政治思想和主张反映了后期封建社会历史阶段二程和朱熹自身的观点。这和春秋战国时期孔、孟的思想观点，是应该区别对待的。

关于教育论。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开创私人办学的人。《史记》记载，孔子门下“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子教育的科目有：《诗》、《书》、《礼》、《乐》，此外还有射、御、书、数等技术科目。孔子教育的内容是文、行、忠、信。文，指文学；行，指德行；忠，指政

事；信，指言语，这四个方面是孔子教育的内容。孔子在教育思想上有很多建树。第一，主张“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第二，主张“有教无类”。第三，学习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要“多闻”，“不耻下问”。第四，学习要不断地思考，要反复地践履和复习。只有不断地反复地学习，才能加深理解；只有在学习的基础上反复地思考，才能够得到深刻的认识。第五，要因材施教，要进行启发式的教学。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做出不同的回答。这说明孔子是主张因材施教的。第六，学习的目的在于致用。学习的根本目的在于从政，在于治国安邦，所以孔子十分强调“学以致用”。如果《诗》、《书》、《礼》、《乐》背诵得谙熟，但却没有实际处理政事的能力，那么，这种学习就是没有意义的。

相传曾子所作的《大学》，明确地提出了所谓的“三纲领”，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三纲领”反映了儒家学派教育的宗旨和目标是：第一，修身或修养德性是教育的根本，第二，以修身为基础，在政治上要实现“治国平天下”的“至善”境界，或最高理想；第三，以修身为基础，在道德上要达到“贤人”、“圣人”的“至善”境界，或最高理想。为了实现这一宗旨和目标，《大学》还提出了所谓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是实现“三纲领”的方法和步骤，只有按照这个方法和步骤去做，才能达到或实现“三纲领”的宗旨和目标。“三纲领”和“八条目”是互为表里的，是统一的，一致的。相传子思所作的《中庸》，在倡导“诚”的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治学方法，认为这是通向“自明诚”的必由之路。《大学》、《中庸》的治学纲领、治学途径和治学方法，是孔子教育思想的继续和发展，它集中地代表了儒